

填补苏州城市文化研究的空白

——谈《苏州学研究丛书》的特色

李少兵

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苏州最灿烂动人、最炙人口、对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首推她的历史文化。长期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对苏州城市文化的研究不多。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曹俊主编的《苏州学研究丛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苏州学”的研究对象是有2500年悠久历史的苏州古城，研究重心是苏州古城的历史文化、人口结构、传统经济及其近代变迁、苏州大运河与世界文化遗产、古典园林、考古文物、民间信仰、民风民俗变迁等等。《苏州学研究丛书》共有10本专著，共200多万字，分别是《世界视野下的苏州：“苏州学”论文集》《苏州人口：历史数据、结构变动与市民生计》《世界遗产：苏州大运河历史文化研究》《物阜民丰：唐宋以来的苏州经济及其近代转型》《“吴风吴韵”：苏州的经典文学艺术》《万年遗珠：苏州的地下文明》《慎终追远：苏州的民间信仰文化》《山水人文：苏州的民风民俗》《道法自然：苏州的园林文化》《吴侬软语：苏州方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专著都是教授级的专家学者利用古代典籍、历代地方志、档案馆档案、原始报刊和田野调查资料等第一手史料花费多年心血写就。

《苏州学研究丛书》有助于苏州文化研究的深入和细化。按照国际学术规范，丛书采用严谨的实证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苏州历史文化、历代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文化，有助于深入了解苏州这座古老城市变迁的历史脉动，有助于深入思索苏州近代化过程中历史文化的际遇，认识现代发展与保护城市文化遗产能够并行，牢固树立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文明意识。

《世界视野下的苏州：“苏州学”论文集》精选了能够代表近百年来“苏州学”研究最高水平的20余篇论文。其中有胡适的《吴歌甲集序》、顾颉刚的《苏州近代乐歌》、李伯重的《工业发展与城市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唐力行《从碑刻看清明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



▲《苏州学研究丛书》正陆续出版
▲姑苏万年桥图 185×73cm 神户市立博物馆

词组，并且具有“人群”的含义，起始于西晋江统所著《徙戎论》，“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此处的“人口”含义，与现在的用法已经比较接近。书中的“苏州人口”，是指自石器时代晚期苏州三山岛出现远古人类活动，直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生活在以苏州古城地域为中心，涵盖今苏州行政管辖区范围内的社会人群。此书重点研究了各历史时期苏州的人口来源、数量、规模、构成、分布、迁徙等重大问题，并给出了严谨科学的结论。此书指出，从古至今，苏州人口都具有流动和“不断迁徙”的特点，所谓“原住民”和“迁移人口”并非一成不变，两者在某些历史时期会相互转化。比如阖闾地区的宋、元原住民，明初被官府大量迁移到江苏盐城等地，而苏北、皖南地区的外来人口则大量迁入。经过明清两个朝代，这些外来



▲苏州城外高寒山寺不远的吴桥处，可见到远处的虎丘塔（20世纪30年代）

州社会比较》《从苏州到上海：评弹与都市文化圈的变迁》、马敏的《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朱英的《民初苏州商会的发展演变》、徐茂明的《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张照根的《苏州春秋大型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范金日的《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日]内藤湖南的《染织相关文献的研究》、[美]张勉治《康熙1684年首次巡视苏州的历史记述》等。编者对近百年来“苏州学”研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学术史梳理，精选出来再版的高水平论文为“苏州学”的研究打开了借鉴学习之门。

《吴侬软语：苏州方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出，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品种多样，经过认真筛选，选定富有苏州方言色彩的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各地的吴歌、评弹和昆曲作为三种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上的苏州方言，在宋代以来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集中反映了历史上的苏州方言真实面貌。此书集中梳理了自宋代至民国苏州各地方志中的苏州方言词语，时间上起宋代，下至1949年，并纠正了部分当代苏州方言出版物中的讹误。此书介绍了吴歌的概念、类型及其经典代表曲目。在此基础上，对历代吴歌如《挂枝儿》《山歌》《夹竹桃》《吴歌甲集》《吴歌乙集》《吴歌丙集》《吴歌丁集》《吴歌新集》《吴歌》《五姑娘》《赵圣关》等进行了集中介绍。吴歌中大量保存了历代苏州方言口语词汇。此书选录了当代苏州山歌集《白茆山歌》《芦墟山歌》《河阳山歌》附录中的方言俗语，以给读者。此书还从语音和喻意两个角度，对苏州评弹中的歇后语进行了梳理。此书研究了《昆曲大全》、《白雪遗音》以及《集成曲谱》等代表性曲谱；介绍了学术界对昆曲韵白与苏州方言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以昆曲《红菱艳》苏白为例，注释了其中的苏州方言词汇，揭示了昆曲苏白在苏州方言词汇研究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苏州人口：历史数据、结构变动与市民生计》指出，从先秦到东汉，“人”与“口”单独使用，前者指人群，后者指个体的人，与表示家庭的“户”相配。“人口”作为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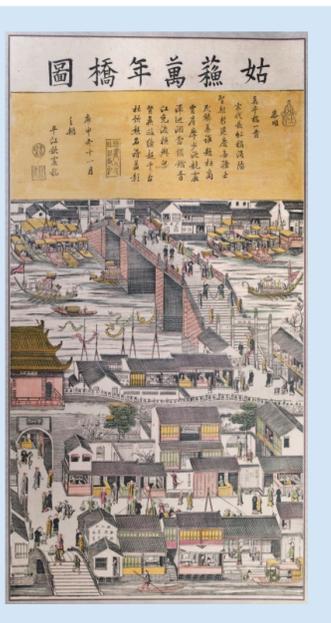
文化景观，是古代人类水利技术与城市建造技艺完美融合的典范。

《物阜民丰：唐宋以来的苏州经济及其近代转型》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苏州经济进行了总结分析，指出自唐宋自近代，苏州经济经历了类型转换、技术更新、结构变动、产业细化等复杂过程，呈现出承接与变迁并存，传统与现代并立的地域经济特色。此书对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民众生产生计、人文氛围、官府管理模式、赋役财政制度、货币流通、金融业规模、行业自治、内外市场等因素对苏州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这些地方要素对苏州“渔农工商”五大特色经济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影响。此书对唐宋，特别是明清以来苏州经济的辐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以“苏帮”商人商会在全国主要城市的布局及其经营活动为研究切入点，在挖掘掌握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其商业贸易活动及商品经营特色进行了归纳总结和细致论述，揭示了千年来苏州经济的开放性、外向性的特点。对于近代以来苏州经济的转型，作者利用上海档案馆的苏州商人商会档案，对“洞庭商帮”在19世纪中后期时转移主要经济活动于上海，拓展海内外金融与贸易并大获成功进行了个案分析，指出这是经济外移成功，并反哺苏州本地经济的成功案例。本书作者对苏州水乡传统的水产、茶、果经济进行了“参与式”试验与研究，长达五年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即便是保持了唐宋以来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小农”经营模式，它们仍有生命力和市场活力。

《“吴风吴韵”：苏州的经典文学艺术》，对先秦至民国两千五百多年来苏州丰富多彩、文韵深厚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精细梳理与研究。上自春秋时期吴国王子季札赏评周乐，评论《周南》，奠定南方儒家美学，下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西合璧的苏州文艺，该书都有专题探讨。在查阅大量一手文艺史料的基础上，对苏州的经典文艺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包括春秋时期吴国的“南风”歌谣、三国时期陆机和陆云的诗歌辞赋、《史记》《吴越春秋》等史籍中有关吴地的名篇佳作、唐代《枫桥夜泊》等苏州诗歌、草圣张旭的苏州遗墨、宋代苏轼和范仲淹的咏苏诗和记苏散文、昆曲、唐寅等四才子为首的吴门画派、冯梦龙的都市小说、苏州园林文学及艺术、近代南宋爱国诗词、民国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影戏剧、叶圣陶和章炳麟的文艺创作与批评等。此书的特色在于重点突出，学理分析深刻，深化了苏州经典文艺的学术研究。

《万年遗珠：苏州的地下文明》对百年来苏州考古的重大发现，出土的丰富文物，丰硕的学术成果进行了充分研讨。此书以不同历史时期的苏州考古遗存为研究重心，对百年来的苏州考古发现进行系统介绍，对相关学术论文、学术专著进行了梳理，对出土或发现的珍贵文物如五代秘色瓷器进行了细致研究。1936年，南京古物保管所所长卫聚贤在苏州石湖发现吴城与越城遗址，并在苏州发现印纹陶与石器。此外，又在苏州木渎灵岩山下，找到了几何形纹彩陶器，此为苏州考古的开端。同年8月，在上海举办了“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大会，蔡元培任主席，卫聚贤任总干事，研究会申明“本会以研究吴越史地为宗旨”，正式开始了对吴越古文化的现代科学考察，标志着对吴越地区从单纯的历史文献研究，走向了与考古调查和发掘相结合的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苏州开展了全市性的文物普查工作，苏州博物馆考古部进行了一系列大遗址、大墓葬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三山岛遗址、龙南遗址、赵陵山遗址、严山玉器窖藏等重要遗址先后发现。90年代，苏州大小真山墓群被发现，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报告、研究论文。2000年以来，苏州考古、地下文明的研究进入“深化期”。木渎春秋古城遗址入选2010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慎终追远：苏州的民间信仰文化》对



苏州源远流长、多元繁盛的民间信仰文化，及其与社会经济、民众生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苏州自宋代至民国流行的刘猛将信仰与苏州本地的稻作文化有密切关系，比如，小神刘猛将的职责主要是驱蝗保稻，祭祀刘猛将有一套完整的仪式，祭祀时民众将刘猛将神像从庙堂请到田野拜祭，体现了稻农对病虫害的关切和迫切解决水稻病虫害的心理。作者对苏州道教观念进行了数量统计与建筑解析，对苏州道教斋醮科仪的历史沿革、复杂程形式、传统道乐等做了细致探讨，指出道教徒通过占醮来表达道教本真，体现了神仙信仰中的济世渡人思想。作者认为，苏州道教节日甚多，且民众参与度较高。道教的神仙信仰在苏州百姓中影响力也很大，体现在苏州民间的烧香请愿、拜神求子和其他日常生活之中。苏州城内的玄妙观，不仅是本地道教信仰的重地，其千年传承下来的道教音乐，很有古风，保留有古代江南特色的丝竹之音。对于苏州繁盛的佛教寺庙与佛教文化，以及民众对佛、菩萨、罗汉、天王的信仰崇拜，此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史料依据的创新性观点。该书还对苏州的神祇祭祀类型，即官祭、民祭、私祭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

《山水人文：苏州的民风民俗》对古今来的苏州民风民俗及其流变进行了深入探讨。苏州民风民俗的产生与发展与本地区的人口结构、自然环境、文化传承、生产力水平等息息相关。吴地民风民俗形成之后，成为社会生活习惯，成为维系历代苏州民众地域归属和情感认同的重要因素。“火耕水耨”“饭稻羹鱼”“吴俗之称于天下者三，曰赋税天下也，曰科第冠海内也，曰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极一时之华奢也”……从先秦开始，历代史籍、地方志中都有苏州风俗的描述与记录。很多文人墨客也留下了与苏州民风有关的诗歌、笔记。近代报刊、杂志也刊载了一些研究专论。该书从苏州民众的地方生产活动、衣食住行婚嫁嫁娶日用等日常生活、社交礼仪、节日节庆、民间娱乐、特色语言文字、历代风俗变迁等方面对苏州民风民俗进行了针对性较强的专题研究。

《道法自然：苏州的园林文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被忽略的民间史料和田野调查资料，对苏州园林的历史渊源进行了重新考证，对历代园林进行了考订和统计，对苏州园林的地方特质和世界范围内的辐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世界文化遗产园林进行了个案研究和重点分析，还对苏州园林蕴含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进行了充分讨论。该书填补了以往苏州园林研究的一些空白点，颇有新意。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

▲苏州环城河，轻舟悠然过水的印景（二十世纪初）

▲由山塘河畔远望虎丘塔与二山门的侧影（晚清）



世界视野下的苏州

曹俊

宋代长虹称洛阳，圣朝新建庆无疆。士民鳞集谁题柱，商贾肩摩少泛航。震泽理澜当锁钥，胥江免渡赖梁。贤侯政绩超千古，社稷勋名得益彰。

这首诗句摘自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藏之清乾隆五年“姑苏版”《姑苏万年桥图》上的题跋，配合美轮美奂的画面，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当时苏州之繁华昌盛景象。这张秀雅隽永之画作尺幅超过一米，气势恢宏、精美绝伦，曾于2016年未在我策划主办的《姑苏繁华录——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特展》上一展展展。且其不论其艺术价值，仅仅透过《姑苏万年桥图》所传递出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可一窥当年苏州的盛况，娓娓读出苏州的历史进步，读出苏州的文化璀璨，读出苏州人民的伟大创造。

自春秋时代苏州建城以来，两千五百多年川流不息。“苏州”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隋代，距今亦有一千四百余年了。自唐宋以降，世人便公认苏州乃江南文化风雅之宗。始于旧石器时代迤至清代的考古史料，丰富而完整，是研究苏州的第一手资料。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确凿之凿凿。具体而言，在太湖三山岛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把人类在苏州地区居住和活动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前推至旧石器时代。在吴江梅珍、吴江同里、吴县张陵山的考古发现，详细记录了苏州的新石器文化面貌；灵岩山墓葬反映了周代“勾吴文化”遗存；阖闾大城、原始青瓷和白玉文物代表着春秋战国时期吴地最有代表性的缤纷样貌；汉代陶器和六朝青瓷是汉魏时期吴郡的重要考古发现；尹山宝藏、秘色瓷碗、平江古城彰显着唐宋文化在苏州的繁盛优雅；张士诚纪功碑和娘娘墓则是元代文化在苏州的重要遗存；反映明清两代苏州的考古成果更透露了苏州的流金岁月。

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对苏州“学问”的记录，既详实亦延续两千多年不绝。比如，春秋时期的《左传》《国语》等；汉代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吴郡记》《吴先贤传》《吴国先贤赞》等；唐代的《吴地记》《苏州记》《姑苏志》等；宋代的《苏州图经》《吴郡志》《吴郡图经续记》等；明代的《苏州府志》《姑苏志》《吴中水利全书》等；清代的《苏州府志》《吴门表隐》等；民国时期的《吴县志》《吴县志》等；1950年以来编修的地方志等史料。这些文献记载配合考古发现与实物，应是可以开展苏州“学问”研究的立足点和可靠来源。

近百年来，海内外学者有关苏州的研究成果雨后春笋般问世，引人瞩目。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对宋代苏州进行了介绍，认



为当时的苏州非常繁华，已是彼时中国的商业、交通中心。美国西北大学柯必德教授在《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一书中指出，19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开始借鉴并采纳西式都市计划。这导致了城市空间在人文和自然领域的变化及转型，这种变化和转型又反过来重塑了城市社会与经济的关系，并决定了苏州作为现代城市的重要地位。苏州大学陆振岳教授在《苏州沿革考略》一文中，对苏州得名的由来与变化、吴国都城、州治和府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订。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故在2015年，我认为，正式提出“苏州学”的概念，并开展系统的整理与深入研究，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当我向学术界同道提出征询意见时，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成。自此，我们与一批海内外优秀学者精诚合作，厘清“苏州学”即是关于苏州的“学问”及其记录和研究，并以此作为研究重心，从多维度，将苏州作为典型案例放置于大历史的叙事中研究，用更为完整的画面——历史、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等，重新发现苏州在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在场”。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迅捷而深度连接起中西方的今天，我们充分吸纳中外优秀成果，既“中”又“外”；既“博”又“通”，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人类学、训诂学和美学等相结合的方法，掷地有声地营建“苏州学”的原创性研究体系。

“结硬寨，打呆仗”。组织团队，奔波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和田野乡间，搜罗文献，查证史实，选题攻坚，既勤搜博采，校勘订正，又取精去粗，开创新义。殚精竭虑，既承人文之精髓，又行文脉之正道。历经六年多的殚精竭虑，我们在苏州的重要遗存，反映明清两代苏州的考古成果更透露了苏州的流金岁月。

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对苏州“学问”的记录，既详实亦延续两千多年不绝。比如，春秋时期的《左传》《国语》等；汉代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吴郡记》《吴先贤传》《吴国先贤赞》等；唐代的《吴地记》《苏州记》《姑苏志》等；宋代的《苏州图经》《吴郡志》《吴郡图经续记》等；明代的《苏州府志》《姑苏志》《吴中水利全书》等；清代的《苏州府志》《吴门表隐》等；民国时期的《吴县志》《吴县志》等；1950年以来编修的地方志等史料。这些文献记载配合考古发现与实物，应是可以开展苏州“学问”研究的立足点和可靠来源。

近百年来，海内外学者有关苏州的研究成果雨后春笋般问世，引人瞩目。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对宋代苏州进行了介绍，认

为当时的苏州非常繁华，已是彼时中国的商业、交通中心。美国西北大学柯必德教授在《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一书中指出，19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开始借鉴并采纳西式都市计划。这导致了城市空间在人文和自然领域的变化及转型，这种变化和转型又反过来重塑了城市社会与经济的关系，并决定了苏州作为现代城市的重要地位。苏州大学陆振岳教授在《苏州沿革考略》一文中，对苏州得名的由来与变化、吴国都城、州治和府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订。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故在2015年，我认为，正式提出“苏州学”的概念，并开展系统的整理与深入研究，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当我向学术界同道提出征询意见时，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成。自此，我们与一批海内外优秀学者精诚合作，厘清“苏州学”即是关于苏州的“学问”及其记录和研究，并以此作为研究重心，从多维度，将苏州作为典型案例放置于大历史的叙事中研究，用更为完整的画面——历史、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等，重新发现苏州在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在场”。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迅捷而深度连接起中西方的今天，我们充分吸纳中外优秀成果，既“中”又“外”；既“博”又“通”，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人类学、训诂学和美学等相结合的方法，掷地有声地营建“苏州学”的原创性研究体系。

“结硬寨，打呆仗”。组织团队，奔波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和田野乡间，搜罗文献，查证史实，选题攻坚，既勤搜博采，校勘订正，又取精去粗，开创新义。殚精竭虑，既承人文之精髓，又行文脉之正道。历经六年多的殚精竭虑，我们在苏州的重要遗存，反映明清两代苏州的考古成果更透露了苏州的流金岁月。

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对苏州“学问”的记录，既详实亦延续两千多年不绝。比如，春秋时期的《左传》《国语》等；汉代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吴郡记》《吴先贤传》《吴国先贤赞》等；唐代的《吴地记》《苏州记》《姑苏志》等；宋代的《苏州图经》《吴郡志》《吴郡图经续记》等；明代的《苏州府志》《姑苏志》《吴中水利全书》等；清代的《苏州府志》《吴门表隐》等；民国时期的《吴县志》《吴县志》等；1950年以来编修的地方志等史料。这些文献记载配合考古发现与实物，应是可以开展苏州“学问”研究的立足点和可靠来源。